

斯诺报道皖南事变真相

郑学富

80年前，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集团控制舆论，对外宣称新四军“叛变”，海外一时疑云四起，不了解事变真相。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第一次将真相在海外媒体报道，并详细揭露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阴谋。



1938年，周恩来、邓颖超和斯诺（左）在武汉。

国民党诬蔑新四军为“叛军”

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在叶挺、项英率领下开始北移。1月6日，当部队到达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7个师约8万人的突然袭击。新四军英勇抗击，激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2000余人分散突围外，少数被俘，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遇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

1月17日，国民党发言人就“皖南事变”发表谈话，宣称：此次事件，完全为整顿军纪，惩处叛变。周恩来得知后，打电话怒斥何应钦：“你们的行动，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们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新闻机关强迫重庆各报必须在18日刊登国民党政府的“一·一七”通告和国民党“发言人谈话”。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拒绝刊载，并组织人员撰写了揭露皖南事变真相的消息和驳斥国民党反动军令的社论，全都被国民党新闻检察机关扣压。他们扣压了稿件后仍不放心，还派出了新闻检查官到《新华日报》社督促，声音要看明日报纸的大样。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满含悲愤地亲笔写下了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四言挽诗“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向国民党反动派的专制统治发出抗议，同时，也是对皖南新四军将士寄托的无限哀悼。

1月18日清晨，刊载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出现在重庆的大街小巷，一时发行量剧增。有的外籍记者以80元代价抢购一张《新华日报》，重庆人民或捐款，或写信给《新华日报》表示支持，海外侨胞亦为皖南事变震惊，纷纷电斥国民党反动派。

国民党强化对新闻舆论的管制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内外一片震惊。为了控制舆论，本来对新闻严格管制的国民党中央对新闻检查更加收紧了，在重庆设立了宣传部国际宣传处，专门负责对外宣传的新闻检查，对外国新闻记者的采访对象、采访行动进行严格限制，对

电讯内容、发电单位进行严格审查，新闻电讯稿必须用英文写明“经重庆送检”字样，盖上“国宣处检查”印章，方能由重庆邮电管理局拍发到国外。有时还故意拖延发电时间，影响新闻时效，致使外国记者很难将真相发回国内。所以从事变发生开始，外国媒体发布的消息都是国民党提供的新四军是“叛军”的消息。

中共中央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坚决击退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正确方针。为争取国际支持，中国共产党充分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积极反共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充分发挥他的外交才能，周旋于美、英、苏等国大使和特使中间，及时向他们说明皖南事变真相，并通过外国记者将皖南事变真相在国际媒体上公布。

斯诺首次在海外媒体报道事变真相

1941年1月，斯诺正在香港，他从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的真相后十分震惊，他气愤至极，奋笔疾书，不顾重庆方面的禁令，毅然通过香港向海外发出几则电讯，公开报道皖南事变以及国民党封锁新闻的真相。美国

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和《星期六晚邮报》等发表了斯诺从香港发回的报道，揭露了事变真相。

斯诺的报道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反响，英国驻重庆外交官证实事件的真实性后，向伦敦报告了中国的“战争中的战争”的事实，而且报告了重庆方面正准备大举进攻延安的消息。驻重庆的西方记者纷纷抗议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国民党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十分狼狈，被迫承认了事实。

国民党政府因此而恼羞成怒，迁怒于斯诺，下令取消了斯诺在中国的记者采访权。

1941年2月，斯诺被迫回到美国。

斯诺进一步揭露国民党制造事变的阴谋

回国后，斯诺继续揭露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行径和险恶用心，他撰写了《这是中国的内战吗》的述评文章，发表在美国《亚细亚》杂志1941年4月号上。

斯诺报道说：“1940年10月19日，蒋介石的总参谋长何应钦将军突然发布命令，要求驻防在长江南岸的新四军部队在一个月内撤至江北一块几乎被日军包围并且荒芜贫瘠的地区

内。”“为避免冲突，新四军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向北转移，由于缺乏弹药和运输工具（已有数月未曾得到重庆的补给），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军得知新四军这次被迫的转移行动，并加以利用，向新四军在安徽省的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主力损失严重。尽管如此，到12月底以前，新四军十分之九的部队已在江北，只有少部分后卫部队还在皖南。在后卫部队中，只有4000人的总部分队是武装人员，除此以外，还有2000名负伤官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由其他人抬着走，其余约2000人为教员、学员、政工人员，国际友人资助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女学生、医护人员和家属。”

斯诺在报道中指出：“从所有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这场战斗是事先经过极为周密策划的大规模伏击战……首先一个事实是，这次袭击从预谋到付诸实施都是在共产党执行政府下达的难以完成的命令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据报道，新四军撤出的防区，不是由国民党军占领，而是由汪伪军占领。第三，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国民党所采取的是幻想加欺骗的做法。目前坚持的说法是新四军已‘不存在’，新四军受到了‘撤销番号’和‘取缔’（蒋介石委员长语）。仅凭颁布一纸命令，绝不可能‘撤销’‘取缔’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命令往往是‘剿匪’——即内战的序曲。”

斯诺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阻止中国回到原始野蛮时代的最大责任在于英、美两国——特别是于后者。据说，对新四军的进攻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实施的。”他直不讳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既干预了中日战争，也干预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均衡。华盛顿必须决定，他们希望那里出现什么样的局势，是扩大内战，取消进一步抗日；还是壮大内战力量，以确保国内合作和民族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改善政治生活，如在盟国援助影响下的高级代表大会上，各抗日团体应拥有席位和发言权。第二，美国的信贷援助应以加强政治合作的经济基础为目的。同时，不管地区间的政治差别如何，均应平均分配。只有这样，“美国的财政援助能够在产生效益，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斯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和合理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开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内。”“为避免冲突，新四军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向北转移，由于缺乏弹药和运输工具（已有数月未曾得到重庆的补给），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军得知新四军这次被迫的转移行动，并加以利用，向新四军在安徽省的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主力损失严重。尽管如此，到12月底以前，新四军十分之九的部队已在江北，只有少部分后卫部队还在皖南。在后卫部队中，只有4000人的总部分队是武装人员，除此以外，还有2000名负伤官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由其他人抬着走，其余约2000人为教员、学员、政工人员，国际友人资助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女学生、医护人员和家属。”

斯诺在报道中指出：“从所有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这场战斗是事先经过极为周密策划的大规模伏击战……首先一个事实是，这次袭击从预谋到付诸实施都是在共产党执行政府下达的难以完成的命令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据报道，新四军撤出的防区，不是由国民党军占领，而是由汪伪军占领。第三，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国民党所采取的是幻想加欺骗的做法。目前坚持的说法是新四军已‘不存在’，新四军受到了‘撤销番号’和‘取缔’（蒋介石委员长语）。仅凭颁布一纸命令，绝不可能‘撤销’‘取缔’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命令往往是‘剿匪’——即内战的序曲。”

斯诺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阻止中国回到原始野蛮时代的最大责任在于英、美两国——特别是于后者。据说，对新四军的进攻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实施的。”他直不讳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既干预了中日战争，也干预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均衡。华盛顿必须决定，他们希望那里出现什么样的局势，是扩大内战，取消进一步抗日；还是壮大内战力量，以确保国内合作和民族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改善政治生活，如在盟国援助影响下的高级代表大会上，各抗日团体应拥有席位和发言权。第二，美国的信贷援助应以加强政治合作的经济基础为目的。同时，不管地区间的政治差别如何，均应平均分配。只有这样，“美国的财政援助能够在产生效益，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斯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和合理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开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内。”“为避免冲突，新四军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向北转移，由于缺乏弹药和运输工具（已有数月未曾得到重庆的补给），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军得知新四军这次被迫的转移行动，并加以利用，向新四军在安徽省的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主力损失严重。尽管如此，到12月底以前，新四军十分之九的部队已在江北，只有少部分后卫部队还在皖南。在后卫部队中，只有4000人的总部分队是武装人员，除此以外，还有2000名负伤官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由其他人抬着走，其余约2000人为教员、学员、政工人员，国际友人资助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女学生、医护人员和家属。”

斯诺在报道中指出：“从所有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这场战斗是事先经过极为周密策划的大规模伏击战……首先一个事实是，这次袭击从预谋到付诸实施都是在共产党执行政府下达的难以完成的命令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据报道，新四军撤出的防区，不是由国民党军占领，而是由汪伪军占领。第三，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国民党所采取的是幻想加欺骗的做法。目前坚持的说法是新四军已‘不存在’，新四军受到了‘撤销番号’和‘取缔’（蒋介石委员长语）。仅凭颁布一纸命令，绝不可能‘撤销’‘取缔’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命令往往是‘剿匪’——即内战的序曲。”

斯诺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阻止中国回到原始野蛮时代的最大责任在于英、美两国——特别是于后者。据说，对新四军的进攻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实施的。”他直不讳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既干预了中日战争，也干预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均衡。华盛顿必须决定，他们希望那里出现什么样的局势，是扩大内战，取消进一步抗日；还是壮大内战力量，以确保国内合作和民族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改善政治生活，如在盟国援助影响下的高级代表大会上，各抗日团体应拥有席位和发言权。第二，美国的信贷援助应以加强政治合作的经济基础为目的。同时，不管地区间的政治差别如何，均应平均分配。只有这样，“美国的财政援助能够在产生效益，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斯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和合理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开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内。”“为避免冲突，新四军尽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开始向北转移，由于缺乏弹药和运输工具（已有数月未曾得到重庆的补给），新四军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日军得知新四军这次被迫的转移行动，并加以利用，向新四军在安徽省的根据地发动了进攻，新四军主力损失严重。尽管如此，到12月底以前，新四军十分之九的部队已在江北，只有少部分后卫部队还在皖南。在后卫部队中，只有4000人的总部分队是武装人员，除此以外，还有2000名负伤官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只能由其他人抬着走，其余约2000人为教员、学员、政工人员，国际友人资助开办的工厂的工人、女学生、医护人员和家属。”

斯诺在报道中指出：“从所有反映出来的情况看，这场战斗是事先经过极为周密策划的大规模伏击战……首先一个事实是，这次袭击从预谋到付诸实施都是在共产党执行政府下达的难以完成的命令的过程中进行的。其次，据报道，新四军撤出的防区，不是由国民党军占领，而是由汪伪军占领。第三，在这次骇人听闻的事件中，国民党所采取的是幻想加欺骗的做法。目前坚持的说法是新四军已‘不存在’，新四军受到了‘撤销番号’和‘取缔’（蒋介石委员长语）。仅凭颁布一纸命令，绝不可能‘撤销’‘取缔’一支强大的中国军队。如此命令往往是‘剿匪’——即内战的序曲。”

斯诺还批评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说：“阻止中国回到原始野蛮时代的最大责任在于英、美两国——特别是于后者。据说，对新四军的进攻是应罗斯福总统的要求而实施的。”他直不讳地指出，美国对蒋介石的援助既干预了中日战争，也干预了中国国内政治力量的均衡。华盛顿必须决定，他们希望那里出现什么样的局势，是扩大内战，取消进一步抗日；还是壮大内战力量，以确保国内合作和民族革命斗争的继续开展。他向美国政府建议，美国对中国的援助要基于两个条件：第一，改善政治生活，如在盟国援助影响下的高级代表大会上，各抗日团体应拥有席位和发言权。第二，美国的信贷援助应以加强政治合作的经济基础为目的。同时，不管地区间的政治差别如何，均应平均分配。只有这样，“美国的财政援助能够在产生效益，有利于中美两国人民”。

斯诺的这篇文章，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美国政府停止了向中国提供贷款的谈判，并向蒋介石暗示，如果中国内战重开，重庆将得不到美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重建新四军军部，整编全军，继续坚持抗战。共产党正确处理皖南事变善后的立场和合理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海外侨胞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的形势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迫于国内外的舆论压力，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公开表示“以后亦绝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

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

（作者为台儿庄战役研究会副会长）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李四光创作小提琴曲

周惠斌

李四光是著名的地质学家，鲜为人知的是，他还具有很高的音乐素养，爱好小提琴，中国第一首现代小提琴独奏曲就是由他创作完成的。

1913年，李四光远渡重洋，考入英国伯明翰大学采矿系，两年后转入地质系深造。期间，他在旧货摊上买了一把小提琴，利用课余时间勤奋练习。1918年，李四光获得硕士学位后，在英国东部一座著名的锡矿山工作。1919年11月，他应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前往巴黎主讲“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

在巴黎短暂停留时，李四光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即兴写了一段乐曲，共5行19小节，并写下了自己的名字（J.S.Lee）、创作时间（22日）和地点（巴黎）。第二年1月，李四光有感于国内军阀混战，民生维艰，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借李白的著名诗句“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以“行路难”为题，创作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独奏曲，抒写了自己及当年一代知识分子即便明知前路坎坷，

依然渴望追求光明的心境，以及学成归去报效祖国的爱国情怀和理想抱负。稿纸右上角题署“仲揆”（李四光的原名）二字，曲谱的右边则写下“一千九百二十年正月作于巴黎”等字样。

1920年秋，李四光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地质系。

1990年3月，上海音乐学院中国现代音乐史专家陈聆群教授为编纂出版音乐教育家萧友梅的文集，专程前往北京探访其侄女萧淑娴，了解到李四光当年曾把自己创作的小提琴独奏曲《行路难》的曲谱，交给好友、音乐家萧友梅教授（上海音乐学院创始人），请他校正，现可能仍在他的遗物中。

回到上海后，陈聆群终于发现了李四光的这一遗物——《行路难》曲谱的创作手稿（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著名小提琴曲《梁山伯与祝英台》作者之一陈钢，客观公允地指出，李四光的《行路难》全曲有头有尾，层次清晰，中间还有转调，并评价道：“最可贵的是乐曲的立意深邃，行路难，这真是中国知识分子苦难历程的一个大概括。”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吴大猷“智取”李政道

崔鹤同

著名的物理学家、教育家吴大猷，1933年从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于次年回国任教于北京大学，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昆明担任西南联大教授。

1945年的一天，19岁的李政道拿着吴大猷在美国时的朋友梁大鹏的介绍信，风尘仆仆地来到吴大猷的面前，请求吴教授收下他的学生。

李政道原来考上了浙江大学，但只读了一年，因日寇侵略我国，被迫中断了学业。

当时正值西南联大的学年中间，不经过考试便不能入学。吴大猷见李政道求学心切，最后就想了一个办法：他和联大教二年级物理数学课程的几位先生商量，让李政道去随班听讲，然后考试；如果他考试合格就可以正式转入二年级，并且可以免他再读二年级的课程。于是，未经学校正式承认许可，李政道便在西南联大做起了旁听生。

李政道勤奋好学，求知心切，又十分聪颖，使吴教授喜出望外。吴教授经常找一些难度高的书籍和题目给他看，每一次李政道都很快地做完了。吴教授从李政道做题目的步骤中发现，他的思维敏捷，不同于同龄人，于是更加关注并着力培养他。

1945年国民政府要公费派人留学美国，在吴大猷和曾昭抡、华罗庚的推荐下，还是西南联大二年级学生的李政道踏上了留美之路，大学还没毕业就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1957年，年仅31岁的李政道就和杨振宁一起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诺奖后的第一时间，李政道就向恩师吴大猷表示深切的感谢：“假如您没有给我这个机会，那就根本不可能有我今天的光荣。”

正是吴大猷的爱才之心，网开一面，“智取”李政道，才使得他如蛟龙入海，鹰击长空，展现出非凡壮丽的人生。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柯仲平创作《无敌民兵》

刘志洲

1943年冬到1944年春，陕甘宁边区文协主席、著名诗人柯仲平率西北文艺工作团到陇东分区各县区巡回演出，历时3个多月。巡回演出期间，柯仲平到边区上的马渠（今镇原县马渠镇）住了些日子。马渠有个游击小组，是一支模范民兵武装，在抗击敌人的骚扰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柯仲平和游击队的同志们一起生活，了解他们，听他们和群众讲英雄的故事，然后便回到庆阳埋头写作。他的写作时间，一般都是从黑夜到天明。

就这样没日没夜地写，几天后，一个可以演三个钟头的大剧本《马渠游击小组》就写出来了。歌剧以陕甘宁边区陇东边区马渠民兵剧团的林巧稚平易近人、淡薄荣誉，为敌斗争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写的是真人真事，用的是真名。歌剧揭露了国民党破坏停战协议，制造事端，挑起内战的罪恶行径，表现了民兵游击小组劳武结合，保卫边区的英勇斗争。歌剧由音乐组的岳松、彦军、川静、刘烽等同志配上调子，陇东味的，民歌风的，又新鲜，又动人。文工团马上分配角

色，排练。有时柯仲平还亲自参加导演，要求特严。他一来，排练场的气氛就变了，谁也不敢吊儿郎当。排练期间，马渠游击小组的同志们常被请来，与演员交朋友、提意见。很快，戏便上演了，群众看得津津有味，及时地配合了当时鼓舞人民、打击敌人的斗争。

1946年边区从平时转入战时状态后，“为战争服务”成为边区文艺工作者最高目标。柯仲平响应“动员起来，保卫边区”的号召，到《马渠游击小组》进行了修改，加入边区边境的一些民兵材料，进行了再创作，改为十六场大型歌剧，定名为《无敌民兵》。

《无敌民兵》是一个规模宏大的为战争服务的题材，以游击小组的建立和巩固，以实际的错综的事件，和不漏掉现实生活中有关细节，呈现出现实生活的画面，是一种教育和战斗情绪的激发。这出歌剧，在解放战争中，在西北战场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成为西北文工团的保留节目。剧本被收在《人民文艺丛书》和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延安文艺丛书》中。

文人轶事

WENREN YISHI

林巧稚的回信

张雨

林巧稚是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被尊称为“万婴之母”。在她的世界里，医院才是唯一的家，而病人则是她最放不下的至亲。生活中的林巧稚平易近人，淡薄荣誉，在她的心中，病人永远占据第一位。

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的一天，林巧稚收到一封“开国大典邀请函”，邀请她出席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能收到这样的邀请函无疑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也是对本人贡献的肯定。

协和医院的同行得知这个消息，纷纷跑来向林巧稚祝贺，大家都说，能参加“开国大典”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每个人都感到骄傲和自豪，无论如何都要参加。

不料，当天晚上，林巧稚却悄悄地

给相关部门回了一封信，那封信的内容非常简单，仅有5个字：“那天我出院。”

很快到了开国大典的日子，医院的同事们以为林巧稚已经前往天安门广场，没想到，她竟然一大早就赶到医院开始工作。同事们很惊讶，于是赶紧提醒她。林巧稚只是淡淡地笑了笑，若无其事地说道：“我已经给相关部门回了信，不去参加开国大典了。”同事们急忙问她为什么？林巧稚认真地回答道：“因为我出院了，我的病人更需要我，我需要守护在病人的身边，那样病人会更安心。”听了林巧稚的回答后，大家不由得发出一片赞叹之声。

林巧稚不仅医术高明，她的医德、医风，奉献精神更是有口皆碑。她看淡荣誉，乐于奉献，并一直以“奉献”作为自己的使命，她是人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O.E.君：鲁迅与郭沫若的“好朋友”

余迅

“O.E.君”小原荣次郎与鲁迅、郭沫若之间的交往，是20世纪上半叶中日交流的一个缩影。作为商人，他来往于中日之间，通过贸易往来获取利益；同时作为国际友人，他也曾利用其日本人的身份为中国进步力量作出了诸多贡献。

鲁迅的旧体诗创作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学术界评价极高，冯至就曾经幽默地说，我们从“鲁迅先生的笔下获得中国旧体诗的最后的奇葩”。同时，鲁迅的旧体诗也受到日本学者和文人的推崇。但鲁迅却常常“言行不一”地说自己不喜欢作诗，也不会作诗，“只有在有人要我写字时，胡诌几句塞责”。他常常无法拒绝“朋友”们的盛情，只好挥笔泼墨。

在鲁迅送给朋友的“诗作”中，《送O.E.君携兰归国》这首带有字母的作品格外引人注目：

椒桂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

这首诗中的O.E.君是谁？在周振甫注释的《鲁迅诗选注》中提到：“O.E.即日本小原荣次郎，当时在东京桥开设京华堂，经营中国文玩和兰草”。小原是日本近代著名的“爱兰家”，他曾在东京上野公园附近购置园圃，专门培植名贵的兰花品种，同时用中国名兰编著了三卷本的《兰花谱》。这首诗正是在小原携兰草回日本时鲁迅所赠之作。

另外，郭沫若《O.E.索隐》一文揭露了其中更多的“秘密”：小原是内山完造的朋友，通过内山认识了鲁

迅。他非常珍视鲁迅送的“诗”，把其嵌在玻璃匣里，在兰花展时进行“宣传”，也会刊登在报刊和杂志上。郭沫若认为鲁迅早已知晓小原的“真面目”，于是“只把小原荣次郎写成O.E.，而没有像对于内山完造那样表彰”。

郭沫若笔下，小原被刻画成一个专门“贩卖中国兰草”的投机商人，但其实他们之间也有过一段珍贵的友谊。郭沫若曾写过一首名为《题兰》的旧诗：

菘菘盈室艾盈腰，谁为金涛谱寂寥，九畹既滋百亩树，美君风格独岷峨。

这首诗写于1937年，是郭沫若旅居日本避难期间，应小原之邀创作的。《O.E.索隐》中也曾提到因为与郭沫若的亲密关系，小原曾经遭受“牢